

毛澤東、彭德懷 合作及衝突的軍事背景

齊茂吉

歷史研究所

已故的美籍學者包威爾（Ralph Powell）在其生前曾指出說：「中共軍人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遠比歐洲共產政權來得重要，因為經過將近三十年來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共始攬得政權。在世界各國的領導階層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像中共一樣具有如此多的軍事資歷和作戰經驗，幾乎目前中共所有的老邁領袖，均曾在紅軍中擔任過高級司令員和政委。」（註一）的確，正由於中共係「馬上得天下」，因此軍方在中共政治舞台上一向居於強勢地位，尤其是第一代職業軍人一直具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

根據經驗理論（Experiential Theory）可將中共政治領袖區分為五個世代——長征世代、抗戰世代、內戰世代、解放後世代及文革世代（註二）。中共第一代職業軍人屬於長征世代，也就是中共自稱的長征幹部。出身長征世代的職業軍人可以說是中共的開國功臣，代表人物就是中共的十大元帥。由於十大元帥擁有顯赫的戰功，因此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共權力結構中位居要津。以八屆一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領導班子為例，在十七位正式委員中，十大元帥就佔有七席，包括：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陳毅、葉劍英、劉伯承。其中彭德懷及林彪係中共建國後，前後兩任的國防部長，然均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的衝突，彭德懷遭到整肅後含冤而歿，林彪與毛澤東反日後，搭機外逃，結果墜機在外蒙古，落得機毀人亡的下場。不論是彭德懷或者是林彪，均重演中國歷史上開國功臣的悲劇。

當初，毛澤東任命彭德懷為中共首任國防部長的主因有二：一、彭戰功彪炳，不僅在武裝鬥爭時期，立下汗馬功勞；而且在韓戰期間，力挫以美國為主力的多國聯軍。二、在第一代職業軍人中，彭德懷係唯一具有現代化戰爭經驗的實力將領。因此一九五五年九月期間，毛澤東分封十大元帥時，彭德懷排名第二，僅次於紅軍之父朱德。

由於彭德懷係抗美援朝志願軍的首任司令員兼政委，在朝鮮半島上親身經歷過現代化戰的洗禮，深深體認到山頭林立且游擊習氣甚重的共軍，應加緊現代化的腳步，並建立正規化的軍事體制，才能應付來自西方軍事強權的戰略挑戰。事實上，在韓戰期間，也就是

一九五一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調訓全軍高級幹部，即要求效法蘇軍的先進經驗，「採用現代化、正規化的訓練，使人民解放軍實現真正的現代化，以適應未來戰爭的需要。」（註三）而彭德懷自一九五二年七月開始，即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註四），迨至他出任國防部長後，更是不遺餘力地推動正規化、現代化建軍，卻導致軍內衝突，並且也伏下毛澤東、彭德懷失和的遠因。

傳統上，中共建軍一向堅持兩大原則，一是黨指揮槍，一是軍隊具有多重功能性。在以黨領軍的原則上，中共師法蘇聯，雙方並無二致，都是經由政委制、政工制來維持黨對軍隊的控制。可是在組織結構方面，雙方卻不盡相同。蘇聯紅軍採取的是一元制，也就是所謂一長制，以軍事指揮員為部隊首長，政工則為副手；而中共軍隊則是經由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以來所發展出來的特殊領導制度——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也就是軍政首長並重的二元制。（註五）至於在軍隊的角色功能方面，中共自建軍以來，軍隊不僅要執行軍事任務，而且也要執行非軍事性的政治任務，這種特色倒是蘇軍付諸厥如的。事實上，中共一直對軍隊施加澈底的政治訓練，試圖將軍隊意識形態化，以便產生「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革命意識，進而達到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目的。

基本上，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一方面確保黨對軍隊的控制，另一方面則由黨領導軍隊從事非軍事性工作。此外為了加強地方軍區與社會動員之間的機制，又將軍隊納入地方黨委的監督及領導，地方軍區的軍政首長不僅是同級地方黨委的當然成員，受同級地方黨委的監督及領導，而且地方黨委書記兼任同級軍事機構的政治委員。這就是解放軍別具特色的雙重領導制度。

然而自韓戰以來，解放軍內部正有一股新興勢力崛起，這股勢力不少人曾經韓戰戰火的歷練，深感解放軍現代化的急迫性。這股勢力除了率領抗美援朝志願軍入韓參戰的彭德懷以外，還包括曾留學蘇聯的劉伯承、葉劍英，以及資深將領蕭克、粟裕、李達等人。這批將領認為，唯有奠定正規化的基礎，才能保證現代化的成功。而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七月間也明確地下達指示：「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要求「把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精神，貫徹到所有部隊中去。」（註六）因此，自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以來，不僅大力推動正規化、現代化建軍；而且積極以軍事院校來培訓「職業軍官團」。當時要求加強訓練幹部，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學校訓練。「因為學校是專門訓練幹部的場所，可以使幹部得到較全面、系統的知識，更快地提高幹部的水平；還

可以起到統一思想、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紀律和統一訓練的作用。這樣，學校就帶動著部隊向現代化、正規化的道路前進。」（註七）迄至一九五七年，軍事院校已達一百二十五所，共訓練各級各類軍官達二十萬人（註八）。此外在韓戰期間，解放軍利用輪番入韓作戰的機會，換裝為蘇軍裝備（註九）。與此同時，中共又自蘇聯進口一批空軍戰機及海軍艦艇，並引進六十個陸軍師的武器裝備。至一九五四年，解放軍終告換裝完畢。（註一〇）在這種情形下，蘇軍的軍制及軍思想無疑也影響了解放軍。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時，彭德懷審定頒發的內務條令，即帶有蘇軍的一長制色彩。（註一一）

在這一系列發展趨勢下，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乃面臨新的挑戰。新興的職業軍官勢力主張，軍隊應將軍事任務列為第一優先，軍事訓練的比重應大幅升高，那麼，相對地必然要減低政治教育的比重和非軍事任務。這麼一來，政委及其轄下的政工幹部的權責首當其衝，軍隊的角色亦隨之緊縮。此一時期，在一些技術兵種，例如裝甲兵、空軍，政委地位大為低落。這種現象在一般兵種，如步兵、砲兵、工兵也照樣存在。（註一二）結果解放軍內部有人對於傳統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產生動搖，並出現了「要實行單一首長制」，「政治機關要大大壓縮」，「政治委員要兼主任，就不會去干預司令部事務，軍政首長不會鬧不團結」，「政治幹部要大批改行」等意見。（註一三）不過日後黃克誠透露，當時彭德懷堅決反對一長制，彭認為：「一長制只能助長命令主義、軍閥主義，只會使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關係疏遠，不能採納。」他表示堅決支持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註一四）

此外在一九五五年二月間，中共頒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務條例」中包含了細密的軍銜制，此一條例即以蘇軍模式為藍本，將一種階層嚴明的職級制度引進解放軍中，此一條例即強調為了「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而制定此一條例。（註一五）此一條例特色有二，一、未提黨的地位，二、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者可直接授予中尉或上尉軍銜（參見此一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可是此一規定並不適用於政治軍官。換句話說，在軍中執行政治工作的政工幹部，在升遷及任用條件方面不如具有專業技術的軍事幹部。由於政治工作就是黨的工作，在「黨指揮槍」的傳統下，政治幹部應比軍事幹部重要，而此一條例實質上已貶低了政治幹部在軍中的地位，當然引起政工系統的不滿。與此同時，解放軍又實行了「三大制度」— 義務兵制、軍銜制、薪金制，這三大制度是解放軍制度上的一項重大改革，也是正規化、現代化建軍的重要措施。（註一六）這些重要軍制不可避免地染上濃厚的蘇軍的色彩，在解放軍推行這些制度後，難免會產生了一

些問題。結果，黨在軍隊的組織功能日漸衰退，而導致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間的衝突。（註一七）不過在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下，政委畢竟是黨委的當然書記，軍事首長只是黨委成員之一，當黨委成員的意見不一致時，黨委書記以其職務之便，當然可以左右甚至操縱黨委的決定。這也是軍、政首長產生矛盾的不可忽視因素。隨著正規化、現代化建軍的推展，軍、政首長的衝突亦趨於表面化，這種現象在一九五五年到五八年期間顯得特別嚴重（註一八）。

必須指出的是，彭德懷在國防部長任內所推動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軍，無意向黨在軍隊的權威挑戰，更無意扭轉黨指揮槍的傳統。更何況，正規化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制度、統一教育和統一紀律等五個統一的建設，主要精神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揮體系，應有助於黨對軍隊的控制。基本上，解放軍政工系統並不反對正規化、現代化建軍，因為高度統一與集中的領導體系應可強化黨指揮槍的效力。問題是，學有專長的職業軍官勢必受到重用，具有院校學歷的幹部也將會逐漸得勢，可是這股勢力抬頭後，不可避免地會走向更專業化的道路，而伴隨著正規化、現代化而來的專業主義勢必威脅到政工系統的職掌，進而削弱黨在軍隊的組織功能，而導致軍內的矛盾。針對軍內衝突的問題，曾有西方學者引用紅專衝突的概念加以解釋分析，如約飛（Ellis Joffe）即為一例（註一九）。

理論上，「紅」代表的是一種政治態度，一種思想立場，強調的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及對黨的忠誠，為了達成共產主義所揭櫫的理想，個人應具有自我犧牲的奉獻精神，獻身於共產主義的事業，至於在黨的整體利益下，個人更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不計個人的利害和得失。為了將這套特殊的價值觀念，灌輸於全黨、全軍、全民，毛澤東生前一直採取強制性的方式，來推動政治社會化，以塑造符合共產主義理想的政治人格。可是在實際運作方面，紅卻具有不同的涵義。在毛澤東生前，以是否忠於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為標準。問題是，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經驗顯示，由於對於毛澤東思想詮釋的差異，任何派系均可利用毛澤東思想落實到本身所提出的政策主張，並加以合法化。尤其是毛澤東支持的政治派系往往將毛所提出的一些解決問題的原則，加以理論化的改造，而成為打擊敵對派系的理論根據，這就成為所謂的「路線鬥爭」。而毛澤東生前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無異是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他支持的派系無疑在先天上就是詮釋意識型態的正統地位，代表所謂「正確路線」。

至於紅專的問題，毛澤東僅表示：「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的統一。…，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

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毛強調說：「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註二〇）由毛澤東的講話可知，紅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政治，唯有抓住思想及政治，才能掌握住正確方向。不過他從未界定紅的內涵到底是什麼，至於能否代表正確的思想或者政治，唯一的標準就是他本人的認同與支持，而這種標準亦隨著權力關係的改變而調整。

至於「專」的基本涵義，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來探討，一是專業性（*expertise*），二是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三是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就中共所指涉的專的狹隘意義而言，應只是專業性，而非專業主義。專業性指的是具有專門的科學技術及知識，專業主義指的是每個行業所具有的特殊態度。漢庭頓（*Samuel F. Huntington*）曾指出說：「就一個特殊的行業而言，職業具有的明顯特徵是專業性（*expertise*），責任（*responsibility*）和團隊精神（*corporateness*）。」（註二一）換句話說，不同職業的人因具有不同的專業性，自然會形成一種與眾不同的團體意識和感覺，並對本身的職業產生一種責任感、榮譽感這種特殊的態度就是專業主義。因此愈具有專業性的行業愈容易產生專業主義。至於專業化的涵義，應包括專業性及專業主義，這也是專的廣泛意義。（註二二）

照說，紅專之間並無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事實上，彭德懷也試圖在紅專之間維持一種均衡態勢，以達到又紅又專的理想，這種理想一旦落實在具體政策的層面，爭論乃告產生。爭論涉及的問題顯然是相當的廣泛，如人與武器孰優孰劣的問題，軍隊政軍任務與訓練時間的比例問題，以及軍事任務與非軍事任務的比重問題。換句話說，到底是突出軍事重要呢？還是突出政治重要呢？雖然，軍內的爭論而產生了軍政矛盾，不過，並未使軍方形成一個對抗黨的壓力團體。而彭德懷遭到整肅的導火線，主要是因為向毛澤東提出了政策的挑戰。有鑑於此，紅專衝突是否可以用來解釋解放軍內的衝突呢？薛爾曼（*Franz Schurmann*）不以為然，他指出，在文革期間披露的大批資料顯示，紅與專的字眼幾乎從未出現過。彭德懷被猛烈抨擊的原因是企圖篡黨篡軍，而不是主張專（*expertise*）。（註二三）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職業軍人在追求國防現代化的目標方向並無異議，可是國防現代化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武器裝備現代化，二是人員現代化。換句話說，現代化的武器必

須由現代化的人來掌握使用。因此，彭德懷在國防部長任內大力推動正規化、現代化建軍，就是希望由軍事院校的專門教育，有計劃地培養學有專長的職業軍官，來促進全軍的專業性。問題是，伴隨著全軍專業性水準的提高，必然產生專業主義的精神，又促使共軍走了更專業化的道路，相對地又提高了專業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的程度，而表現出兩種傾向，一方面對於外來的非專業性的干涉及干擾將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排斥作用，另一方面基於本身的專業領域也不會干涉或干擾非本身專業的領域。可是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他認為這種發展趨勢不僅有違解放軍的「革命傳統」，也就是軍隊必須扮演多重功能性的角色，是戰鬥隊、生產隊及工作隊；而且也危及黨指揮槍的傳統，尤其是他對軍隊的控制。

針對正規化、現代化建軍對所謂光榮的革命傳統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解放軍政工系統業已警覺到這種危機。在一九五五年八一建軍節時，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元帥及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上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大將先後提出警告，羅強調：「…我軍的光榮傳統不單在過去是必須的，而在現代化建設中更是必須的。」（註二四）譚則露骨指出：「…不要機械地搬運外國經驗。因為外國軍隊有他們自己的傳統，有些作法對於他們來說是習慣的，對於我們就不習慣，勉強去做，就顯得格格不入。」（註二五）顯然，政工系統已察覺一味師法蘇軍的舉措，已經威脅到革命傳統的延續。而彭德懷在八大上雖然強調：「我們努力學習蘇軍的一切先進經驗，可以縮短摸索過程，少走彎路，迅速完成我軍的現代化建設。」不過他也提出警告：「我們學習外國軍事經驗的時候，又必須採取分析批判、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能迷信盲從，機械搬用。…近幾年來我軍所頒佈的條令和制度，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基本上是適用的，但是有些地方沒有良好照顧我軍的歷史特點和實際情況，存在著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影響了軍內外團結。」（註二六）事實上，彭德懷提出教條主義的問題，係根據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反教條主義的指示（註二七）。而八大後不久，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羅榮桓被解除了總政治部主任、總幹部部長及政治學院院長三職，羅的去職可能是對於解放軍政治工作執行不力，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則由譚政升任。

一九五七年二月，彭德懷率譚政視察南京軍事學院，此一學院係由出身二野司令員的劉伯承元帥於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創辦，並擔任首任院長兼政委。劉除了主掌軍事學院外，還擔任在一九五五年成立了與總參謀部平行的訓練總監部部長，統一領導全軍的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蕭克上將則擔任副部長。此外一九五七年在北京成立高等軍事學院時，劉伯

承亦出任首任院長兼政委。當彭德懷至南京軍事學院視察時，劉正在上海養病，而彭認為軍事學院「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同時對於學院領導在反教條主義時「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表示了意見。彭在執行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反教條主義指示的同時，將建國以來建軍方針的歷次提法，分為否定和肯定兩種看法。彭認為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所提的「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軍隊，沒有「革命化」這三個字，顯然是錯誤的；而一九五三年以後所提的「建設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才是正確的方針。而這兩種提法是兩種對立的方針。（註二八）

主持訓練總監部常務工作的副部長蕭克則大不以為然，他認為，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對怎樣反和反什麼，沒有具體的分析和研究，產生了否定一切或者否定太多的偏向。對於彭德懷一九五七年二月視察軍事學院所提出對於教條主義問題的嚴重估計，他表示不同意。此外針對彭提出的兩種對立的建軍方針的看法，他也不同意，他認為：「不應把中央軍委、毛主席開始提出的『正規化、現代化』口號同毛主席後來提的『現代化、革命化』口號對立起來；而應看作都是對的，前者是包括和密切聯繫著我軍革命化的政治內容提的，後者是前者的完善。」（註二九）針對此一問題蕭克曾上書彭德懷。

在解放軍進行反教條主義鬥爭時，顯然彭德懷對於主管全軍教育訓練及院校工作的劉伯承，是不滿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劉被解除訓練總監部部長一職，而由葉劍英元帥代理，一段時間後，再由蕭克升任部長。針對學習蘇軍經驗的問題，葉劍英主張要認真學習，同時要加以分析批判，學到手以後又要加以發展。此外，葉不贊成給軍事學院戴上教條主義的帽子。（註三〇）葉的態度當然令彭德懷感到不快，這是彭德懷與劉伯承、葉劍英失和的背景。最後演成一九五八年中共軍委擴大會議中爆發兩條路線的嚴重鬥爭。

當解放軍高層醞釀衝突危機之際，總政治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間召開全軍整風會議，決定在全軍普遍展開整風運動，主要是由揭發內部矛盾，並討論如何處理內部矛盾，而進入整改階段。與此同時，解放軍在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下及總政治部的部署下，全軍投入這場反右鬥爭。（註三一）當反右運動接近尾聲之際，一九五八年五月廿七日至七月廿二日期間，中共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此次會議是在三月期間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按：成都會議）中決定的，原來會議的重點議題是檢查軍委和各總部對工作的領導。當林彪參加成都會議後返回北京，他聽說不久前在訓練總監部四級幹部會議上，對怎樣認識和怎樣反對教條主義有爭論。他即認定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副部長

李達（蕭、李亦是國防部副部長）是「反對反教條主義」的。四月間林彪即向毛澤東建議將軍委擴大會議主題改為開展反教主義鬥爭，毛同意他的建議，並決定要劉伯承作檢討。（註三二）在軍委擴大會議召開前幾天，也就是五月廿五日那一天，毛澤東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突然拔擢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註三三）林彪也是十大元帥中第二位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將領，另一位是朱德元帥。毛澤東啓用多年來一直在養病的林彪，當然有其權力的考慮。不過以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的發言內容及態度來看，當時毛澤東重用林彪並非是刻意打壓彭德懷。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揭幕後，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擺出了支持彭德懷的姿態，暗示有的人不能在彭德懷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經過一段小型會議，劉伯承、葉劍英先後被點了名。六月一日，彭德懷批評蕭克說：「…你不同意我批判正規化口號的提法，寫信給我，說只是執行中的問題，我不能同意。就是執行中的問題，也得要批判。」（註三四）由此可見，在此次會議上，彭德懷顯然是堅決執行毛澤東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在這方面毛澤東、林彪及彭德懷的立場是一致的。接下來，會議氣氛不斷升高，「六月五日，一位總部的領導幹部在小型會議上作了『關於軍隊建設中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發言，在六月二十日的大會上，又講了一次。」並公開點名蕭克就是資產階級建軍思想、建軍路線的代表，將整個會議形勢拉高為路線鬥爭的層面。六月七日小型會議轉成大會，出席會議者有全軍軍以上單位及部分師級單位負責人，共一千四百餘人。會議採取彭德懷在開幕式宣佈的方法——大鳴大放，鬥爭的氣氛也愈來愈強烈。訓練總監部及軍事學院一些領導幹部，數次檢討，難以過關。（註三五）六月下旬，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抨擊了師法蘇軍經驗的作法，他說：「戰爭中參照蘇軍條令執行是不行的，還是搞自己的條令。不知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做教條來背。如果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要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而教條主義者主張抄蘇聯，請問蘇聯當時是抄誰的？八大決議中有一節關於技術改革的問題，按照今天的發展情況來看，提得不妥當，就是過份強調蘇聯的幫助。爭取蘇聯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還是自力更生，如果過份強調依靠蘇聯援助，請問蘇聯在當時又依靠誰來幫助呢？」接著又強調：「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以整風方式大鳴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經驗教訓，主要是教育全黨全軍，團結全軍。」毛澤東在會上點名批判了蕭克，他抨擊說：「蕭克同志不僅有教條主義且是個軍閥主義，有資產階級思想、教條主義、封建主義。…蕭克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過去沒有這樣的時機來開這樣的大會，今天

有了這個時機，我們可以挖教條主義的根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會上公開指出說：「我軍從開始就存在著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古田會議鬥了一下，但沒有說服有錯誤意見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還堅持著錯誤路線。」（註三六）毛澤東這種說法等於是擺明軍內已發生路線鬥爭，並暗示有人仍然堅持「錯誤路線」。

七月上旬，劉伯承抱病由寧進京參加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檢查發言。蕭克也在會上作了檢討，「但會議對蕭克的批評上綱很高，言詞甚重，並因他在某些問題上對彭德懷有一些不同意見，竟被說成是「反黨」、「反軍委領導」。」（註三七）至於彭德懷在會上則以含沙射影的方式批評劉伯承、葉劍英，他說自己「被訓練總監部撤了職，進不了訓練的大門」，「有些問題我現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留過學，不是學術權威…」（註三八）（按：劉伯承、葉劍英均曾留學蘇聯，劉伯承畢業於蘇聯最著名的伏龍芝軍事學院。）七月十九日，彭德懷在會議上作了總結發言，他說：「在軍事訓練部門和某些院校中，極少數同志具有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他們一直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抗拒中央和軍委關於反教條主義的指示，嚴重地阻礙了反教條主義運動的開展。其中，蕭克同志，不僅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而且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以他的面貌來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彭並且再度重申毛澤東所定下的基調，他說：「錯誤的軍事路線產生的主要根源是：過渡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鬥爭，在我軍內部的反應。」（註三九）

七月廿二日，大會通過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中指出：「訓練總監部和一些院校，教條主義傾向直到最近仍佔著統治地位。而且某些個別同志，還堅持了一條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現在我軍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基本上是我軍歷史上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鬥爭在新條件下的反應」，「錯誤路線…在一段時間和一些部門、一些單位中可以橫行無忌，俘虜群眾，甚至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這就證明，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過程。」決議要求：「日前的鬥爭必須在全軍認真開展。」（註四〇）根據軍委擴大會議的決議，訓練總監部和高等軍事學院、軍事科學院，分別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深入揭批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蕭克被說成「為了販賣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在訓練總監部內「糾合了十多個人的小班子」，「進行反黨反軍委領導的宗派主義活動」。至於劉伯承自一九五〇年主持創辦軍事學院以來的工作及貢獻，根本上遭到否定，不但無功，而且有「罪」。（註四一）在這場被視為

中共建國以來第一次軍內大鬥爭中，毛澤東一度打算撤掉劉伯承元帥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在與劉伯承長期共事的總書記鄧小平力保下，劉伯承才未被逐出政治局，不過被迫辭去了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職務。葉劍英元帥不再主管全軍軍事訓練和院校的領導工作，調任軍事科學院院長。粟裕大將亦遭波及，被免掉總參謀長職務，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總參謀長一職由黃克誠大將接任。訓練總監部被撤銷，蕭克、李達兩位上將均被免掉國防部副部長職務，並被調離解放軍，蕭克任國家農林部副部長，李達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註四二）

由於軍委擴大會議認為原來提的「正規化、現代化」是排斥否定革命化，被當成錯誤的「建軍路線」加以反對。此後長達二十年的時間，正規化實質上遭到廢棄，不過正規化、現代化係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七月間欽定的建軍方針，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向蘇聯軍隊學習的決策。（註四三）而彭德懷自一九五二年七月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又出任首任國防部長，因此推動正規化、現代化建軍的主要負責人就是彭德懷。問題是，在促進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的同時，如何維護「光榮的革命傳統」，彭德懷也一直試圖將兩方面的特色結合起來，以改造解放軍。不過，由於劉伯承、蕭克負責全軍的教育訓練及院校工作，培訓職業軍官團，這批學有專長的職業軍官對於解放軍興革一向雄心勃勃。尤其是劉伯承一手創辦的軍事學院已成為培養軍中高級領導骨幹的重要基地，在解放軍已形成一股旭日東升的新興勢力，對彭德懷不僅產生壓力，也令彭德懷感到來自劉伯承、蕭克的威脅。因此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決定在解放軍開展反教條主義鬥爭時，彭德懷乃趁機打擊劉伯承、蕭克，結果葉劍英、粟裕、李達均遭牽連。在這次軍內大鬥爭中，彭德懷顯然與毛澤東、林彪站在同一陣線來對付劉伯承、蕭克等人，因為彭德懷深諳這關係到毛澤東非常在意的革命傳統問題。但是若說劉伯承、蕭克推動一條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話，那麼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又是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又如何能置身事外，毫無任何責任呢？這實在難以自圓其說。事實上，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是解放軍高層的一場權力鬥爭，遭到整肅的將領均是軍事系統，而未波及政工系統。會後不久，總政治部在軍中即發動幹部下連、軍官當兵運動。至於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的關係也由合作開始走向衝突。

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總政治部正式作出「關於各級幹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的規定」，規定全軍從各大軍區的首長到各級領導機關的廣大幹部，都要有計劃地下放連隊當兵鍛鍊。下連當兵的幹部，應編入班、排、歸班、排長指揮，在連隊過黨團生活，與士兵

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作、同娛樂。（註四四）解放軍全軍普遍推行幹部下連、軍官當兵運動，主要目的就是改善官兵關係，重新提倡革命時期所標榜同甘共苦的精神，來縮短實施三大制度後所造成的官兵差距，以促進部隊團結。當時人民日報曾發表專文鼓吹幹部下連當兵，並公開批制「正規化一度影響了官兵平等」（註四五）。據估計，到一九五九年八月為止，總共有二十五萬多名軍官，其中包括大批將領，下放到連隊當兵。（註四六）這無疑已影響到職業軍官團的專業自主性。

當毛澤東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同時，中蘇兩共的關係也開始有了裂痕，產生紛爭的導火線就是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的問題。（註四七）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那一天，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致函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馬利諾夫斯基在信中表示，為了便於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迫切希望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在中國大陸選一地點，由蘇聯中共兩國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的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信中還具體提出，建設這兩座中心所需的費用，蘇聯負責大部分，出資七千萬盧布，中共負責小部分，出資三千萬盧布，建成後歸蘇聯控制。彭德懷將此事呈報毛澤東後，毛對此非常警覺，決定指派彭德懷與蘇聯軍事代表團談判。經過多次會議後，六月五日彭在呈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主張，先同意與蘇聯專家來華進行一些技術性工作，至於投資和使用的問題再與蘇聯商談。毛對彭的建議，不以為然，六月七日在彭的報告中批示，中共負擔一切費用，但雙方共同使用。六月十二日，彭德懷覆函蘇方表示：中共同意建設大功率長波電台，歡迎蘇聯在技術方面給予幫助，但一切費用由中共全部負擔，建成後中蘇兩國可共同使用，但所有權歸中共。不過，蘇聯對中共要求擁有電台的全部所有權這一原則性立場不予重視。在七月十一日蘇聯向中共提出一協定草案，堅持由蘇聯中共雙方共同建設和管理，電台則歸雙方共有。結果，中共拒絕蘇聯此一合作方案。事後，毛澤東在接見蘇聯派駐北京大使尤金時強調，在軍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適當的。

當中共蘇聯關於共建長波電台的問題發生爭執時，七月廿一日尤金大使求見毛澤東，就答復中共希望蘇聯提供原子潛艇一事時，轉達了赫魯曉夫希望同中共商議建立一支共同艦隊的建議，尤金大使表示，由於蘇聯的自然條件不能發揮艦隊的作用，黑海會被敵人封鎖，波羅的海更不用提了，北面也不寬闊，東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因而要建立一支同艦隊。毛澤東聽完後立即對尤金大使說：「首先要明確方針，是我們辦，你們幫助，還是只能合辦，不合辦，你們就不給幫助。」七月廿二日，

毛澤東再次約見尤金大使，並向尤金大使明確指出，如同合資建設長波電台一樣，建立共同艦隊也是一個涉及主權的問題，毛澤東生氣地說：「打起仗來，蘇聯軍隊可以過來，中國的軍隊也可以到蘇聯去，我們是同盟國，可是搞共同艦隊，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權，提出所有權各半，是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半個指頭也不行。你們可以說我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了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講，我也可以講，你們要把俄國的民族主義大到中國的海岸。」毛澤東堅決拒絕了蘇聯的要求，並要尤金大使毫無保留地將他的意思如實地向赫魯曉夫匯報。針對此一問題，彭德懷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若拒絕蘇聯的要求，將會影響兩黨的關係。而且雙方合作的話，將來中共也可以使用蘇聯境內的軍事基地。當場，毛即生氣地拒絕了彭的提議。毛生性一向多疑猜忌，對於彭與蘇聯的關係當然存有戒心，這也是後來彭遭到整肅時，被冠上「裡通外國」罪名的遠因。

赫魯曉夫獲知後，立即在七月卅一日啓程密訪北京，與毛澤東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雙方的立場、意見可說是南轅北轍，毫無共識。赫魯曉夫這趟北京之行，可說是相當不愉快，八月三日即提前結束行程返回，這是中共、蘇聯關係「由頂點到鬧翻的開始」，毛澤東後來表示：「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一九五八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正由於毛澤東、赫魯曉夫不歡而散，所以毛澤東未告知赫氏關於炮擊金門的計劃。不過這次會談益加強化了毛澤東炮擊金門的決心，毛澤東這麼說：「赫魯曉夫自不量力，你不是同美國拉關係嗎？好，我們放砲慶祝，這些砲彈放久了，就沒有用處了，不放砲慶祝一下，做什麼用？」在炮擊金門期間，毛澤東與彭德懷的關係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事實上，解放軍福州軍區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即已擬好炮擊封鎖金門的方案，當時毛澤東決定等待一個有利的時機再發動炮擊金門的戰役。剛好在這一年夏天的時候爆發了中東危機，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發生推翻親西方的費薩爾王朝的軍事政變，政變後伊拉克政府宣佈退出美國主導的巴格達條約，對美國在全球圍堵共產主義的防線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七月十五日，美國以保僑為名派海軍陸戰隊登陸黎巴嫩，並佔領貝魯特。七月十七日，英國亦借機出兵約旦。針對美英軍事介入中東，毛澤東決定利用中東危機發動炮擊金門的戰役。（註四八）毛的用意係讓美國無法集中全力同時應付這兩大危機。當時，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已接近尾聲，在會議落幕前幾天，七月十八日晚上，毛澤東召開緊急會議，出席者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及海空軍首長，毛澤東在會上決定炮擊金門。當天晚上，中央軍委召開會議，彭德懷在會上傳達了毛的指示，部署了炮擊金門的作戰事宜。（註四九）「因為這是一次極其複雜而又特殊的行動，毛澤東由始至終親自籌劃並直接指揮這次行動。」

(註五〇) 在毛主席控下，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在整個戰役中似乎毫無置喙之餘地，甚至幾篇重要的對台文告亦由毛澤東親自起草，而以國防部長的名義發佈，這種現象顯然是不尋常的。(註五一)

至於中共方面事後探討毛澤東發動炮擊金門的原因，「通常歸納為打擊美國對台灣的侵略，反擊國民黨軍騷擾和支援中東人民進行反美鬥爭這三項，這些確實是促成中共中央、毛澤東確定炮擊金門的直接原因。」(註五二) 此外，「實際上毛澤東在確定炮擊金門的決策時還有更深遠的戰略考慮。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就戰爭與和平問題中蘇兩黨產生了意見分歧，一九五八年春夏因「長波電台」事件，中蘇國家關係又出現陰影，同時中共內部又正在掀起「超英趕美」為目標的「大躍進」運動。對於一向將軍事問題同政治問題聯繫起來考慮的毛澤東來說，這些因素當然會影響到決策時的思考。面對美帝國主義在中東和台灣的侵略，強調它是『紙老虎』，就必須以實際行動同它鬥爭，並以向習慣以『老子黨』自居的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顯示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獨立自主態度。同時，以對敵鬥爭激發人民的革命熱情，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促進革命和建設，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想法。另一方面，內部要爭取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就需要摸清美國對中共的戰略意圖，尤其是美台的所謂「共同防禦條約」的底盤如何，通過有限的軍事行動可以進行戰略上的摸底。此外，在沿海採取有力的軍事行動，對於確保我國的東南地區的安定和領海權益，也會起到有益的作用。」(註五三)

基本上，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而不直接發動對台灣、澎湖的軍事攻勢，主要是基於戰略的考慮，因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美國承諾協防台澎，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直接攻打台澎，無疑是與美國公開攤牌，逼使美軍在台海與解放軍一決雌雄。由於美軍擁有壓倒性的海空優勢，解放軍若冒然發動渡海攻台戰爭，無異是以卵擊石，根本沒有任何勝算可言。因此毛決定炮擊金門，主要在於試探美國在台海危機中軍事介入的範圍，以及美國支持台灣的程度。有鑑於此，毛並未準備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在解放軍炮擊金門前三天，八月廿日北京電令在福建前線負責指揮此一戰役的福州軍區第一政委葉飛立即飛往北戴河，廿一日下午毛召見葉飛時，曾特別詢問炮擊金門時能否避免造成美國人傷亡的問題，當時美軍在金馬外島派駐顧問至國軍營級單位。(註五四) 此外，在八月廿三日解放軍正式炮擊金門的當天下午，毛「才最後確定按預定計劃炮擊」(註五五)。毛在發動此一戰役時顯然是相當謹慎，「既要向美國提出警告並示威…努力避免使事態擴大，避免中美之間的正式開戰。」(註五六)

當時蘇聯在解放軍中派有軍事顧問，解放軍炮擊金門的行動不僅未對蘇聯軍事顧問保密，同時也將相關行動通報蘇聯軍事顧問。（註五七）因此，赫魯曉夫應是知情的，八月廿三日解放軍發動炮擊金門戰役後，赫魯曉夫在九月五日親自打電話通知北京，將派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秘密至北京，向中共當局轉達蘇聯對台海局勢的看法。當天周恩來即向蘇聯駐北京的參贊表示，「中共炮擊金門、馬祖並不是要用武力攻佔台灣，只是要懲罰國民黨軍隊，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如果打出亂子，中共自己承擔後果，不拖蘇聯下水。」（註五八）事實上，赫魯曉夫的動機是可以理解的，蘇聯不願意捲入金門炮戰，而與美國產生直接的軍事衝突，甚至可能爆發一場沒有必要的核子大戰，赫魯曉夫當然擔心毛澤東的軍事蠢動可能帶來的風險。九月六日葛羅米柯抵達北京後，當天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葛羅米柯表示蘇聯當局完全支持中共中央的行動。「雖然赫魯曉夫表面上對中共中央表示了支持，其內心對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的態度是十分不滿的。」（註五九）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赫魯曉夫赴美訪問，與美國總統艾森豪舉行戴維營會談後，趕至北京出席中共國慶十週年招待會，在眾多中共領袖在場的國慶宴會上，赫魯曉夫即席發表了四十分鐘演講，並以教訓的口吻，要中共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註六〇）接下來在十月二日那天，赫魯曉夫率同葛羅米柯等人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毅進行長達七小時的會談中，不但對中共在一九五八年炮擊金門給蘇聯造成了困難而有怨言，並且對中共對台政策也表示了不滿（註六一）。此外在中印邊界問題及印度介入西藏問題上，赫魯曉夫刻意袒護印度的作法，更令會談充滿了對峙的氣氛，不僅沒有緩和雙方的分歧，反而加深了彼此間的矛盾。（註六二）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間衝突的白熱化，對於當時已遭到整肅並已下台的彭德懷來說，無異是雪上加霜。

當解放軍炮擊金門的同時，配合人民公社化運動，毛澤東又掀起大辦民兵的活動，在勞武結合的原則下，組建亦工亦農亦兵的勞動大軍。九月廿九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民兵問題的決定」，實行全民皆兵（註六三）。至一九五八年底，全中國大陸民兵總數已發展到二億二千萬人，占人口總數三十五%，絕大部分青壯年男女均被編入民兵隊伍。（註六四）站在彭德懷的立場，他當然不支持民兵計劃。薛爾曼（Franz Schurmann）認為，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的爭執，關鍵問題之一就是民兵問題。由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期間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上，同意提出的關於毛澤東不作下屆國家主席的提議，這對毛而言，無疑是一次挫敗。因此薛爾曼推測，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也就是彭德懷遭到整肅的這段期間，彭曾試圖取消組建民兵的程序。（註六五）那麼聯繫彭反對

大躍進運動來看，彭可能企圖扭轉大躍進運動，來中止民兵組建工作。

詹克斯 (Harlan W. Jencks) 分析指出，彭德懷得罪了政治委員這批人，這批人乃利用大躍進的機會，重新獲得失去的權力和威望。由於幹部下連運動，使得一批又一批的高級將領下放至連隊當兵，在這批職業軍事將領的心目中，彭德懷的信譽也開始減弱。加上，在幹部下連運動發動的那一個月（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與蘇聯軍事同盟的可靠性也產生了嚴重的問題。因為在台海危機中，美國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對蔣介石提供了實質的援助，反之，蘇聯對北京的支持卻顯得緩慢、謹慎和吝嗇。彭德懷一向與蘇聯盟邦保持親蜜一致的關係，蘇聯這種反應嚴重地削弱了彭德懷的政治地位。（註六六）結果在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終於遭到整肅，被迫黯然下台。

註 釋

- 註 一：Ralph Powell,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34 (June-July 1968), P.39.
- 註 二：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Publishers, Inc., 1981), p.101.
- 註 三：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一九二七～一九八）」七（北京：軍事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五一—五。
- 註 四：同註三，頁五二〇。
- 註 五：See Jonathan R. Adelman, *The Revolutionary Armies —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ie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England: Greenwood Press, 1980).
- 註 六：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二七—六。
- 註 七：林蘊暉、范守信、張弓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四四—六。
- 註 八：同註六，頁二七七。
- 註 九：中共派遣志願軍參加韓戰後，向蘇聯求助。蘇聯表示可以提供貸款給中共，中共再用這項貸款購買蘇聯的武器彈藥。自一九五〇年以來，中共總共向蘇聯借貸五十六億舊盧布（約合十三億四千萬美元），主要是用在韓戰上面。而彭德懷利用志願軍輪換入韓作戰時，逐步換為蘇聯的武器裝備。中共同時也建立一系列軍事工業。參閱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頁六七七—六七八；劉杰誠，

「毛澤東與斯大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頁五七九。

註一〇：同註六，頁二七七。

註一一：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註一二：解放軍報，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七月十九日，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註一三：同註六，頁二七九。

註一四：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註一五：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

註一六：同註七，頁四四七～四四九。

註一七：Ellis Joffe, "The Conflict between Old and New in the Chinese Army",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64), p.130.

註一八：Ellis Joffe, "The PLA in Internal Poli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iv (November-December, 1975), p.3.

註一九：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50

註二〇：毛澤東，「關於「紅專」問題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輯（一九六七年四月），頁一七。

註二一：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8.

註二二：Paul H. B. Godwin,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A Receptualization", in Dale R. Herspring and Ivan Volgy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yste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8), P.221.

註二三：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564.

註二四：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註二五：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九月廿四日。

註二六：彭德懷，「關於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全文載於黃達之編著，「彭德懷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年七月），頁三一二～三一四。

註二七：同註六，頁二八〇～二八一。

註二八：同註六，頁二七七，二八一～二八四。

註二九：同註六，頁二八四～二八五。

註三〇：同註六，頁二八五～二八六。

註三一：同註三，頁五六二。

註三二：同註六，頁二八六～二八七。

- 註三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一九一九，五～一九九〇，十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頁二三三。
- 註三四：同註六，頁二八九。
- 註三五：同註六，頁二八九～二九〇。
- 註三六：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丁望主編，「『毛澤東選集』補遺」（第三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九）（香港：明報月刊社，一九七一年），頁一九六～一九九。
- 註三七：同註六，頁二九〇～二九一。
- 註三八：同註六，頁三〇一。
- 註三九：同註六，頁二九一。
- 註四〇：同註六，頁二九二。
- 註四一：同註六，頁二九二～二九三。
- 註四二：同註六，頁二九四。
- 註四三：同註六，頁二七六～二七七。
- 註四四：同註三，頁五七四～五七五。
- 註四五：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
- 註四六：李澄、曉季、王立兵主編，「建國以來軍史百樁大事」（北京：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一四九。
- 註四七：關於中共與蘇聯間就有關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所產生的紛爭問題及其始末，本書所引用的資料主要是參考吳正裕、蔣建農，「毛澤東」中關於「反對霸權主義」部分，此一部份摘錄於高樹、邢斌、王謙、楊青編，「歷史巨人毛澤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頁一三七八～一三八〇；王進等主編，「毛澤東大辭典」（廣州：廣西人民出版社及灑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頁一二六～一二七；李健編著，「中南海詠嘆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頁二二七～二三五；叢進，前引書，頁三四八～三五〇；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五一～二五二；師東兵著，「廬山真面目——彭德懷反黨集團」事件揭秘」（香港：港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五月），頁一〇八～一一一。在上引資料中關於蘇聯提出的艦隊合作計劃，有兩種提法，一是共同艦隊，一是聯合艦隊，本書為避免與「林彪事件」中的「聯合艦隊」秘密組織混為一談，故採用共同艦隊的說法。
- 註四八：徐焰，「『台海大戰—海峽風暴金門對決』上編：中共觀點」（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十月），頁一九五～一九六。
- 註四九：艾凌耀，「炮擊金門作戰述略」，北京「軍事史林」雙月刊一九九〇年五月號，頁五九。

註五〇：同註四八，頁一九六。

註五一：葉飛，「毛澤東坐鎮北戴河親自指揮——葉飛筆下的八二三炮戰」，台北「傳記文學」月刊第五十六卷第三期，頁二二～三三。

註五二：同註四八，頁一九六。

註五三：同註四八，頁一九七。

註五四：同註五一。

註五五：同註四八，頁二一九。

註五六：同註四八，頁二一九。

註五七：同註四八，頁二〇〇。

註五八：同註四八，頁二〇一。

註五九：同註四八，頁二〇二。

註六〇：同註六，頁三五二。

註六一：同註六，頁三五二～三五三；另參閱註四七引用「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中摘錄吳正裕、蔣建農合著「毛澤東」中關於反霸權主義部分，頁一三七九～一三八〇。

註六二：同註六，頁三五三～三五四。

註六三：同註三，頁五七五。

註六四：同註四八，頁二一四。

註六五：Franz Schurmann, p. it. p.567.

註六六：Harlan W. Jencks, "China'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1949-1980", in Morris Janowitz, ed.,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Regional Perspectives* (Berkele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1), pp.125-126.